



没有买办，外国商人就做不成生意。而买办不能独自完成交易，每一方都存在知识和其他训练方面的缺陷。所以国外贸易只能通过双方在优势互补中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尽管每一方都有合约或协议来保护他们自己，但合约和协议不可能对所有可能产生的问题都预见到并做好相关条款规定，因而这样的合约和协议在实际中能行得通，靠的是相互的信任和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信誉。一定程度的诚实守信制约着双方，这就是合理的发展。

# 中國人的 洋鬼子

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

张珂 郭德钦 王茂盛  
张文琳 袁武振 校对  
译

[美]卡尔·克劳 /著  
(Carl Crow)



当马可·波罗 (Marco Polo) 从中国回到威尼斯时，他已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人。如果不是他带回来的珠宝、丝绸和麝香，那么他现在可能是一个被大家遗忘并且已经死去的人——就像曾经到过地球遥远地方的其他威尼斯冒险家一样，回家时身无分文，在贫困中悄悄死去。那么，他的邻居们也不会动身去中国寻求发财之路，寻找到达中国的更短路线的渴望也不会持续下去；那么，哥伦布的历史性航程同样没有动力，这个航程不是为了证明地球是圆的，而是为了提供一条到达东方富国的更好的贸易航线。



神父和商人一般结伴而行来到中国，但是一旦他们踏上这片热土，他们的行进路径则大不相同。早期外国商人并未沿用爱好和平的中国商人的方法。他们很少或几乎不带任何货物，但返程时却盆满钵满。中国人称这些人为海盗，并在沿海修建了瞭望台，当发现海盗到来时，就通知大家逃避。海盗一度频频制造麻烦，以致中国皇帝命令沿海所有居民向内地迁移数英里，并且毁掉所有房舍，使海盗一无所获，只能空手而归。



所有这些的结果就是外国人几乎不用带任何钱币，只需用签付收条这样极为便利的方式来应付一切事情。仅有的必须付现金的服务是坐黄包车，因此，在洋人口袋里装着的那些零钱通常称之为“黄包车钱”。而乘黄包车的费用如此之低，以至于人们会像借个香烟火那样简单地让朋友帮忙付黄包车钱。

# 旧中国的洋人

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

[美]卡尔·克劳 / 著

(Carl Crow)

张珂 郭德钦 王茂盛 译

张文琳 袁武振 校对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2N1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中国的洋人 / (美) 克劳著；张珂，郭德钦，王茂盛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8

ISBN 978-7-5613-6541-0

I. ①旧… II. ①克… ②张… ③郭… ④王… III.  
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1661号

**旧中国的洋人**

---

著 者 / 卡尔·克劳

译 者 / 张 珂 郭德钦 王茂盛

责任编辑 / 孙国玲 徐 婕

助理编辑 / 胡 杨

封面设计 /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4

插 页 / 1

字 数 / 241千

版 次 /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6541-0

定 价 / 28.00元

---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251046 (传真)

## 前 言

本书主要讲述西方人与东方人如何在中国沿海相遇，及其所代表的东西两种文明如何在生意上由相互冲突到彼此了解，并彼此喜欢对方。本书的讲述方式是散漫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合逻辑的。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双方生活方式，尤其是居住在中国沿海的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在这里，旧习俗依然存在着，而新的习俗在缓慢而又不稳定地增长。虽然它不甚明显，但是贯穿其中的故事脉络清晰可见。友谊，尽管它经常中断，但在日益增长。直到第三方的出现时，即当人们认识到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时，友谊才彻底破裂了。

当时，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的洋人并不知道，也许有所怀疑，日本人征服中国企图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尽管此时中日双方都是主权独立的两个国家。日本以算计的眼光审视西方，对中国步步为营、锱铢必较。中国的变化是自然的，也是更从容的，也更少算计之心。东西方文明在中国的融合自然地发展，这是人们之间不断接触的结果。其实，政府的干预和强制很少。当外国人和中国人首次遭遇且彼此藐视对方时，彼此都充满偏见。这些偏见缓慢冰释，同时大家发现换一个视角，是值得彼此欣赏和尊重的。中国西化缓慢，但比日本彻底。在日本，他们是以国家统治者命令的形式而西化的，而在中国，西化则成为中国国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人们自愿接受了西方习俗。

对于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是令人愉快而又刺激的，那儿的生活使之特立独行，因为他不自觉地会拥有许多中国人的特质。然而我们所钟爱的古老中国已经逝去，竭尽所能亦不能使之生机盎然。旧中国的洋人以并不颠覆传统的方式，开始了新生活，他们也必须根据军事态势而随机应变，对他们来说这种生活方式令人讨厌且令人陌生。未来的新中国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地方，不可能依然固我。

旧中国的洋人在中国已经成为故事，因此，他们的经历必须用过去时来叙述。无论目前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结果如何，外国人享有特权的日子都行将结束。当中国人打破旧秩序，他们的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这需要很多年且伴随着种种变革的迹象。旧中国的洋人是特殊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生活的世界已满目疮痍。旧中国的洋人很难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乐此不疲地穿行于中国沿海的俱乐部，回忆着过去的美好时光——带着些许苦涩，他们在诅咒这一时代。不知何故，这使我想起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老矿工，当富矿脉被采掘一空时，他们仍然留在那些鬼城中待了很久。我知道旧中国的洋人的感受，因为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

卡尔·克劳

# 目 录



## 前 言

第一章 马可·波罗的追随者/1

第二章 奢侈的传统/9

第三章 富有的买办/21

第四章 发了财的洋人/31

第五章 冒险家的乐土/43

第六章 先生可以赊账/53

第七章 拍桌子的洋人/63

第八章 国旗的保护/73

第九章 出卖国旗的洋人/83

第十章 流浪汉、乞丐和海员/91

第十一章 美国圣徒与中国罪人/99

第十二章 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人/109



第十三章 洋鬼子建造的城市/119

第十四章 狗与华人不得入内/129

第十五章 白人的威望/137

第十六章 难以忘怀东方人/145

第十七章 憎恨洋人/155

第十八章 旧中国的烤鸭/165

第十九章 中国沿海的家庭主妇/175

第二十章 寂寞的单身汉世界/183

第二十一章 洋鬼子找乐子/191

第二十二章 跨洋伸手的洋鬼子/201

第二十三章 一个时代的结束/209



# 第一章 马可·波罗的追随者

“前人开路后人行”

当马可·波罗（Marco Polo）26年后从中国回到威尼斯时，他已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人。最重要的是他那充满奇幻和冒险的旅程。如果不是他带回来的珠宝、丝绸和麝香，那么他可能是一个早已被大家遗忘并且已经死去的人——就像曾经到过地球遥远地方的其他威尼斯冒险家一样，回家时身无分文，在贫困中悄悄死去。那么，他的邻居们也不会动身去中国寻求发财之路，寻找到达中国的更短路线的渴望也不会持续下去；那么，哥伦布的历史性航程同样没有动力，这个航程不是为了证明地球是圆的，而是为了提供一条到达东方富国的更好的贸易航线。

1295年的夏天，马可·波罗先生回到家乡时，他有一肚子故事要讲给大家听。他说他见过的中国许多城市都大于威尼斯及其可憎对手热那亚；宏伟的墙壁高过山顶，而且一望无际；长达数百英里长的运河犹如飞箭般笔直。他说流通于全国的纸币就像金币一样等值。那里的人们温文尔雅，且富有教养，他们绝不会在背后捅刀子的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1324]：世界著名旅行家和商人

方式来解决双方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

此情此景欧洲人闻所未闻。他言及之事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它远远超过了那个时期的欧洲人的想象力。大家认为他是个不太透亮、信口雌黄的说谎者。有关纸币的故事更是荒诞，因为欧洲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任何类型的纸币。还有更荒唐的是他总是坚持说，他曾经亲眼看到一种古怪的岩石，中国人从地下把这种岩石挖出来用作燃料，火焰比最好的木材燃烧起来还要炽热。他还说中国的人口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尽管如此，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都过得丰衣足食，几乎人人都有一件专为节日而穿的丝绸礼服。马可·波罗的名字成为说谎者的代名词。当孩子们讥笑爱说大话的玩伴时，常用一种夸张的方式挑衅地说：“马可·波罗也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他是史上最爱说实话的旅行者之一，然而，在他活着时，甚至死后的几代人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个说谎者。由于声名狼藉，他死得颇不宁静。1324年，在他临终前，有人还要求他收回谎言以宽恕其罪孽，但直到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他一直喃喃地说道：“我所讲述的只是一鳞半爪、挂一漏万。”

尽管其家人和邻居都不相信他的故事，但是他回家时所带的财富却是最好的佐证。为了庆祝其荣归故里，他举办了一个由威尼斯的波罗家族参加的盛大家庭宴会。当所有仆人被撵出房间并锁上房门之后，马可·波罗换了一件衣服，衣衫褴褛戏剧般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说这件衣服是他从遥远的中国一直穿回来的。接着他撕开斗篷和上衣的夹层，许多奇珍异宝——红宝石、钻石、蓝宝石、绿宝石和珍珠散落一地，犹如绷破了口袋的麦粒一样。他的珠宝之多，足以让国王嫉妒。他破旧的行李袋被人送了进来，波罗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份丝绸礼物，他比威尼斯的任何人都富有，但这只是他带回来的九牛一毛，他的富足不可想象。二十年后，他仍然把藏在某些地方的珠宝或是一小块麝香或是一卷丝绸锦缎拿出去换钱用。他从中国带回的一些珍贵的宝石可能被用于即将竣工的圣·马克(St. Mark)大教堂祭坛上的装饰物。

随着马可·波罗发财消息的传开，许多威尼斯人动身去中国。一个新大陆被发现了，那里承载着威尼斯人难以置信的发财梦。他们或许并不知道，马可·波罗是在中国政府任职时，是靠偷逃政府税款而发财的。那些马可·波罗的早期追随者发现了许多新的商路，但他们之中鱼龙混杂，海盗和诚实的商人一样多。温和的中国人富足殷实，但容易上当受骗。长久以来，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霸占海盗领域的时间并不长，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不久就在利润丰厚的海上掠夺中独领风骚。

这些威尼斯人经营的航线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我乘飞机从罗马到仰光，花五天时间走完了马可·波罗多年的路线。想当年，他和他的追随者用了数年才走完这段令人疲惫不堪的路程。这条航线上的危险如影相随，且各种辛酸无以言表，以至于两百年后哥伦布上将试图另辟蹊径，希望能找到另外一条更好的航线，然而他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他们的旅程超过环球航程的三分之一，途经许多语言陌生而又风俗奇特的国家，并且随时准备自卫，以免受在航行中出现的海盗和窃贼的袭击。他们必须吃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来充饥，有时甚至找不到食物。但是他们只要一想到马可·波罗的珠宝，航行结束后的衣锦还乡和荣华富贵，这些艰辛自然就不在话下。财富的诱惑力吸引着芸芸众生。当哥伦布扬帆去他所认为的中国东海岸时，他满怀希望能见到许多居住在那儿的同胞。

许多人从地中海来到中国，不仅仅在于渴求财富和敢于冒险。当十七岁的马可·波罗和其父亲、叔叔一起起航时，他们在半路上遇见了两位多明我会（Drdo Dominicanorum）的传教士，教皇授权他们去中国传送基督教。这种商人和传教士结伴而行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无论是有些人来到中国赚到了钱，还是使那儿的灵魂得到了拯救，所有这些人的成功都激起了别人无穷的兴趣。传教士的开拓之行是糟糕的。这两名多明我会的传教士配不上长期以来人们赋予他们的虔诚和英勇形象，因为航行的第一站已使他们筋疲力尽，并且对眼前的危险惊慌失措。他们上报教皇说由于生病只好打道回府，并让马可·波罗的父亲捎给中国皇帝一些宗教圣物。

然而当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他言及在中国建有景教<sup>①</sup>（Nestorian Christians）教堂。这令他们非常惊讶。前往这一陌生国家的罗马神父有了新的工作驱使，因为景教的教义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夙敌。在世界遥远一方还存在着这么一个异教派，这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来说，比起那些数以百万计的佛教信徒来说更是一个挑战。罗马天主教会与景教的宿怨是率先在中国国土上开始的信仰之争，这些争论多属信仰层面、政治层面、商业层面，中国人对此兴趣索然并且置身事外。这些争论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国的景教并没有罗马天主教会想象的那么强大，于是罗马神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国的异教徒身上。没有人发现景教教徒的后裔在中国形成聚居地并在此建立景教教堂，也没有人发现那些由于种族大屠杀第一次大规模从巴比伦逃亡到中国的犹太人后裔的踪迹。中国有景教教堂，也有犹太教堂。但是由于礼拜者都是中国人，其中已不再能发现一丁点犹太教徒或是景教教徒祖先的印

---

<sup>①</sup> 景教，在西方称聂斯托利派教会，在唐代传入中国，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

迹。中国已经同化了他们，就像她拥有多个民族一样。

数百年来，成千上万个罗马的天主教神父去了中国，他们学习汉语，接受了中国饮食和服装的风俗习惯。表面上，他们似乎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他们使用筷子吃饭，剃掉了前额的头发并且扎起了长辫，穿上了中国肥大的裤子及带有夹层的棉布上衣和马褂。他们建立起简陋的教堂，宣传天主教、移风易俗，最后在困惑中死去。在信仰层面，他们是上帝的使者，但对广大中国民众而言，他们全都被视为洋鬼子，是暴乱民众的活靶子。

从地中海千里迢迢到达中国的神父们认为，中国人既不信仰上帝又未开化，于是就满怀信心地准备给中国人带来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督教的祝福。但是，当他们到达中国以后，他们接触到的是一个远比欧洲更先进的文明，这种文明正像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样。欧洲尚未出版任何印刷书籍，但在中国佛教寺庙的藏经阁里却堆满了印刷而成的书，它们是用雕版印刷的，大型寺庙里都有些印刷设备。学者在全国上下都受人尊崇。那些光脚的修道士，诸如那些试图劝说爱尔兰异教徒改变信仰的修道士，在中国是徒劳的。只有那些高智力和学识渊博的人才不会被中国文人所鄙视，这是罗马天主教会历经重重困难之后而学到的，因此，教皇早期的愚蠢政策随后得到修正，学识渊博的耶稣会教士（Jesuits）被派往中国为皇帝效力。他们校正了中国的天文理念，并指导中国工匠建造了一个能和欧洲比肩的天文台。南怀仁神父（Father Veribest）是中国数学馆馆长，而汤若望、利玛窦和其他神父都成为深受中国皇帝或高官信任的心腹顾问。

他们与中国人教学相长。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大量藏书甚至还未编目，但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无异于马可·波罗破旧衣物的夹层中散落的珠宝一样诱人。由神父们所从事的研究、翻译中国文献的工作持续了数百年，甚至比建造欧洲的任何一所大教堂所用的时间都长，而且仍将持续下去。天主教堂由于有此类神父的杰出工作而声名鹊起。后来的新教传教士非常精明地继承了这一传统。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中国人才知道了基督教，也正是通过他们，西方人才接触了孔子和其他许多圣人的思想。

神父和商人一般结伴而行来到中国，但是一旦他们踏上这片土地，他们的行进路径则大不相同。早期外国商人并未沿用爱好和平的中国商人的方式，他们很少或几乎不带任何货物，但返程时却盆满钵满。中国人称之为海盗，并在沿海建立了瞭望台，当发现他们到来时，就通知大家逃离。他们一度频频制造麻烦，以致中国皇帝命令沿海所有居民都向内地迁移数英里，并且要求毁掉所有房舍，使海盗到达那

里一无所获，只能空手而归。几个世纪以后，在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初始阶段，中国人就是运用这个“坚壁清野”的政策进行了有效抵抗。

来到中国的神父最初也与人为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和海盗一样令人生厌。耶稣会教士、方济会修士和多明我会修士对以下问题感到困惑而争论不休：中国子女对父母的孝道以及读书人对孔子崇拜的半宗教式的情愫，特别对用哪一个中国词汇来翻译“God”分歧严重。也许是

为了显示其助人精神，也许为展示其学识渊博，中国皇帝力图解决后一个问题，但是神父们对此却不买账。最后所有的问题都提交给教皇，而教皇对中国汉字目不识丁，并且做出了使中国皇帝生气的决定，激怒了这位“天子”，他即刻解散了自己帝国里的所有天主教机构，遣送神父们回国。商人也跟着神父们一起离开了中国，因为中国皇帝的愤怒是针对所有洋人的。只有葡萄牙人留在了1557年租借的小块殖民地——澳门，通过与日本和中国的商业贸易，他们获得了巨额财富。如果没有此类不幸之争论，在古老的中国习俗和礼仪问题上，如果神父们能够识相一些，那么那时基督教就有可能取代在中国的佛教。

在相互承认和合法性基础上与中国的商业贸易重新恢复时，外国人的地位已有所改变。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不再是海上霸主，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英国成为它们的继任者，同时正是由于英国人的不懈坚持，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才被打破。在苛刻和屈辱的条约下，外国人在广州拥有了对外贸易的权利。毋庸置疑的是由于军事压力，外商和传教士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特权，更多的港口渐渐开放。对外贸易和现代中国的发展肇始于1842年，这一年英国舰队驶入长江，打了几个零星小战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美国人根据利益均沾原则享有了英国人通过军事和外交胜利获得的一切特权。在美国有一句话流传已久：我们从未与中国开战，但我们拥有英国人通过战争所获得的一切。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难听，但事实就是这样。

面对彼此间通商贸易上的激烈竞争，英国和美国基于诸多共同的利益结成联盟。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在远东事务中存在着非官方的盎格鲁—美利坚联盟，那么这往往意味着效率。伦敦、华盛顿的官方圈子里对这种联



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现场

盟可能没有正式说法，它也没有必要介入两国的外交和领事官员之间的协议或共谋。这一联盟的形成是基于英美在一些诸如司法和权利等传统事务方面具有相同的思想方式。

上海的公共租界（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是两国的代表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齐心协力使英语成为中国的商业语言。英国人取道印度来到中国，带来了等级观念和种族偏见以及维护白人特权的观念。他们是贸易和协会组织中的领导者，美国人接受并且吸收了英国的商业理念和礼仪，某种程度上直到他们回国时才发现他们被误认为英国人，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英国人对他们的影响。

商业贸易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商船穿梭而至。竞争在各地弥漫开来，虽然有时也存在失败的风险，但利润还是很大的。一些早期的公司变得非常富有，建造了极其奢华的办公场所，并且一掷千金，以至于人们认为它们是“王宫”。他们举止得体并且拥有较好的商业用房，除此之外，他们还积极作为以校正人们的社会分类观。他们向人们证明，他们的既得地位是理所当然的。通商贸易中的海盗因素仍然存在于冒险者身上，他们来自许多国家，雄心勃勃，希望一夜暴富。虽然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呈现出不同画面，但是规划几乎千篇一律——瓜分中国财富。其中一些人获得了成功，另外一些人被扔进了监狱。

外交官也来了。《南京条约》签订前，傲慢的中国官员嘲笑他们是“野蛮部落的朝贡者”，要求他们谨慎从事和绝对服从，并警告他们不要打扰“天子”的宁静。外交官们奋斗了一百多年终于勉强获得承认，即白人平等于中国人。随后一百年中，中国人却为获得与外国人平等的权利而不懈努力。当中国人在坚船利炮威胁下开始谈判时，外交官被认为是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国家的蛮横代表。中国官员必须极尽文雅之能事去哄骗和安抚他们，因为他们拥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枪炮。一旦事态发展达不到他们的理想，他们就重操大吼大叫和猛拍桌子的野蛮习惯。在中国官员看来，所有外国人都很讨厌，其中外交官尤甚。

通过雇用外国人来为之效力，中国解决了许多由于外国人的存在而产生的问题。马可·波罗是成千上万外国人中第一个以某一才能或其他方面为中国政府服务的外国人。华尔（Huaer, Frederick Townsend Ward），美国人，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叛军，

开始组建近代中国军队。查尔斯·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上尉，英国军官，继之完成了这一任务。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美国人，中国政府全权委派他去欧洲和各国民政府谈判缔约事宜。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爱尔兰人，在中国组建了海关和邮政部门。他们只是在中国政府中任高官的几个人。中国政府的工资簿中，即使没有上千人，至少也有几百个外国国民。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中国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会像忠诚于自己的祖国一样勤勤恳恳地为她服务。

每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自以为在种族和智力上都高出中国人一等，都陶醉于将为人之师的沾沾自喜之满足感，其中英国人和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要多得多。在这个与中国人交往的新时代的初期，没有任何事情能向洋鬼子表明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完美，但是马可·波罗到访中国七百年后，外国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向中国人学习。

传教士的确教给中国人许多东西——医药和教育，尽管并非刻意，但是已经激起了中国人对洋货的羡慕，这是有利于外国货物的销售的。甚至商人们教会了中国厨师如何做西餐、服务生如何调制鸡尾酒、裁缝如何制做外国服饰等。每人都认为自己在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方面起了明显的作用，但是他们很少考虑到中国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他们。外国居民没有丧失其种族特征，但是中国的生活已使他们与其本国人有所不同。中国沿海地区的外国居民群体可能代表五六十个国家，但是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东方色彩的人生哲学，虽然他们佯装鄙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但是他们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其中的精华。也许中国的“教”远远胜过“学”。

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有十足的理由视洋人为野蛮人，因为这些洋人甚至很少懂得如何进入房间、喝茶或接请柬才是得体的，一言一行都暴露出其粗野。洋人的行为举止令人讨厌，但是中国人还是包容了他们，并且发现其古怪风俗很有意思。中国人没有讨厌洋人到憎恨的程度，因为在人际关系方面，中国是最宽容的民族。有些外国人被暴民杀死，只因为他们自己的许多愚蠢行为而咎由自取。中国人可能分不清那么多不同的国籍，因为中国人把所有洋人都叫做“洋鬼子”。他们对这些洋人视而不见，除非情非得已。洋人的影响力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中国像只负重前行的水牛，只是在苍蝇太讨厌时，它才会偶尔喷一下鼻息，或者摇一下尾巴。但是，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最终还是被打破了，不是因为外国的坚船利炮，而是因为与外国商人、传教士的接触——这种接触总体上来说是亲密而友好的。<sup>①</sup>

对“洋鬼子”的分类是笼统的，这只是那些对所有洋人都认不清的中国人才使用的称呼。红面孔、突出的眼睛以及奇装异服，在中国人看来，这些与魔鬼形象无二，不可能把他们视为人类。金发碧眼更让中国人难以接受，因为这远远超出了中国人所想象中的人类的正常外貌。但是还有更糟糕的，在许多乡下地方，外国人仍然是令人可笑的稀奇物。当我到中国内地出差，遇到中国小女孩，她们看到我时，就害怕地大叫起来，并跑向她们的妈妈。小男孩在安全的距离外对我又叫又骂。年长者当着我的面时尽可能保持严肃，但是当我转过身后他们就会哈哈大笑。我想每一个从通商口岸外出游览的外国人都会经历和我一样的事，并会发现——处处会发现——微笑或大笑在中国人看来往往是人性中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当中国人和外国人熟悉起来并且成为好朋友之后，他们会发现在奇特的外表、粗俗的方式和古怪的习俗之外，这些漂洋过海的洋人尽管皮肤不同，但许多地方都与他们相同。由于他们的巨大宽容，以及在洞悉他人性格方面的较强能力，中国人最先承认其同为人类关系。白人则不然，对这种同为人类共同的兄弟关系的承认要慢得多。不幸的是，英国人是经由印度和马来半岛诸国到达中国的，那些

地方种族分界线的划分是非常严格的，但这在中国并不存在。对于英国人来说，中国人就是另外一个劣等的有色种族，因此就存在着诸多对中国人的不必要的误解、恶感，甚至流血。

外国商人们都想追随马可·波罗，希望一夜暴富，衣锦还乡。他们唯一担忧的是暴富的时间长短。许多人直到变得衣衫褴褛，却还待在中国，仍然没有珠宝可缝在衣服夹层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错过了回国船只。只有很少人能按时按他们的预期回家，但也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荣归故里。那些确实回了家的人，无论是回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或者其他十多个国家，往往发现这是一次令人失望之旅。中国的东西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古老中国的轮廓和声音对于他们来说亲切无比，他们一旦离开中国不久又急不可待地返回中国。成百上千本来想回国颐养天年的老人又改变主意，重返中国，死在中国。



罗伯特·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在中国长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中国近代邮政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①原文如此。中国历史书上说，西方凭着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 第二章 奢侈的传统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满洲和朝鲜山区的树木遮天蔽日的地方，生长着一种根分成两支的野生植物，其通常呈现出与人的身体相似的形状。由于这种形状的暗示，长期以来，中国人就相信这种根有药用价值，且对于延长人的生育能力和生命都非常有效。它是中国药典中最常见的药草，在药典中它被称之为“人参”。一些老而粗的根仅仅因为它比普通的更为惊人地像一个健壮的人而能卖极高的价钱——每盎司<sup>①</sup>几百美元。由于生产一种芳香而粘质的茶叶，对于次等的、破损的根也是供不应求的，且价格不菲；饮用这种茶叶的多是希望能使他们返老还童的中老年人。

人参是中国最古老的中药材之一。中国人食用人参的历史已有好几百年了，尽管外国医生宣称人参是毫无价值的，但人们仍然使用。人们能在中国任何一家顶级药店里看到展示的人参。在满洲地区的人参被挖的数量是如此之巨，以至于它有绝

---

①1 盎司约 31.1 克。

种的危险，后来它得到了一个皇帝谕旨的保护，此谕旨规定，除了皇帝批准的，任何采集收买人参的人都是死罪。这种保护措施颁布得太迟了，不能起到实际效果，因为人参在满洲地区已经非常稀少，以致出口人参是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而且那些被发现的少量的人参在当地就被卖掉了。这实际上形成了朝鲜的垄断地位，超过一个世纪的药草出口平衡了这个幽闭王国<sup>①</sup>的微不足道的对外贸易。每年都有一支驮畜队从汉城出发，运送贡品献给中国皇帝，随同而来的是带着很多人参的商人，这些人参在北京的价钱是如此之好，以至于其收入可以抵消朝鲜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其中，最上乘的人参是给中国皇帝的贡品中的一部分。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山区，人民发现了一种相似的植物，是同一个物种，但不是同一种类。当这些殖民地州脱离英国，获得了独立之后，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对外贸易，这种药草的根茎成了他们所拥有的唯一出口的畅销商品，而中国是这种商品的唯一销售市场。由于这种在地理上分布异乎寻常的奇怪而又无用的植物根，两个从地理上相隔千里之遥的民族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另一种引起美国人兴趣的草本植物是茶叶。当整箱整箱的中国茶叶被扔到港湾里的时候，波士顿倾茶事件<sup>②</sup>为推动美国独立运动起到了巨大作用。茶被视为殖民地居民所喜爱的少数奢侈品之一，它的价格应该也比较便宜，因为他们买的只是不能在英国出售的次品。但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使得它也要卖很高的价格，这是这些殖民地州居民长期以来不满的地方之一。进口他们自己的茶叶的能力成了一种独立的象征，因而，使得美国商人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美国人没有工业品可以出售。实际上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有一股无穷的力量，这来源于他们自己的贫穷并受到他们刚刚实现的独立的激励。但中国人有茶叶，而美国人有人参，尽管他们不知道这种人参的品质是多么的低劣。

在华盛顿将军目睹了最后一支英国军队从纽约撤走之后不到三个月，飞箭船“中国皇后号”就从这个港口出发踏上了去广州的远途行程。这是美国第一次投资对外贸易，是野心勃勃而又具有戏剧性的。由于船的行程被耽搁了，起航正好赶在华盛顿的生日那天，也就是 1784 年的 2 月 22 日。这艘船的赞助商们确切地意

<sup>①</sup> 幽闭王国（Hermit Kingdom），是 1637-1876 年间朝鲜的别名，因其在此期间，除了与中国来往之外，不与任何别的国家打交道。

<sup>②</sup> 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发生在 1773 年 12 月 16 日的北美殖民地波士顿人民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的事件，最终导致美国独立战争。